

◇电光倒影

乔宗玉

谁能拯救“南京”？



寒冷的冬夜，在电影院看《金陵十三钗》(编剧:严歌苓,刘恒,导演:张艺谋),74年前日本军队在南京制造的那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浮现在银幕上，一群教会学校女生和一群秦淮河妓女的命运因为这场战争意外地交织在一起,扣人心弦,从容就义 的国军战士、被战难唤醒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国混混,他们与豺狼般的日军的较量,更让人感受到正义的力量。

早在 2006 年,我就读过登载在《中篇小说选刊》上的严歌苓所著的《金陵十三钗》,原著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从 14 岁的女学生书娟的视角,拉开“南京大屠杀”序幕。原著中,书娟和名妓玉墨在战争前便有恩怨,书娟仇恨玉墨勾引自己的父亲,影片里这段前史被抹去了。在原著里,五位国军战士逃进教堂,一边养伤,一边和女学生们讲述着战争,而玉墨则为伤兵们表演伦巴舞,拨弄着戴教官的心,最后,五位战士相继牺牲。这些,电影中都不复存在,只设置了李教官、小战士浦生两个角色。李教官将浦生藏在教堂,自己则在不远处,暗暗保护教堂里的女人们,最后壮烈牺牲。其中，豆蔻与浦生的情感关系基本沿用了原著的框架。原著末尾,我清晰地记得,玉墨为了掩饰自己行刺前的惶恐,朝日军大佐那“娇羞地一笑”,永远记在了书娟的心头。比较遗憾的是,电影中的玉墨没有展现那“娇羞地一笑”,尽管如此,这并不淹没“玉墨”这一形象的光辉。

通过电影《金陵十三钗》,我们感受到张艺谋这位国际大导历经十年“大片”探索,终于学会了“讲故事”，这自然得归功于严歌苓小说丰厚的文学底蕴。通常,由一部好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戏剧,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情节土壤,导演的“二度创作”自然轻松很多。可以说,文学确实是电影、戏剧的母亲。

《金陵十三钗》整个情节都是在紧张、压抑中推进,遍地狼烟,兽性大发的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作为中国女性,不论是贞女,还是妓女,大家都面临随时可能被污辱、被伤害的可能。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当时的中国士兵只能用“人肉炸弹”的方式炸毁日军坦克,看到我们的同胞被凌辱致死时,悲壮感与悲愤感油然而生,而这一切,从深远的角度想,便是国家积弱,政府无能,不能保护老百姓。人民沦为“亡国奴”,尊严扫地,才是大不幸。

南京自古以来,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沧桑,悠悠秦淮河,流不尽数千年的英雄血和女儿泪。《金陵十三钗》中,一群妓女替一群女学生赴日军宴会,以“羊脂球”式的自我牺牲为自己的人生抹上圣洁之光。美国混混假扮神父救了那群女学生,可谁来救那些烟花女子呢?我忽而想到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南京的基督》,上世纪初,秦淮河小妓女金花深恋着已婚的日本男人,又将一个西方男人幻想成基督,进而献身染上性病去世,事实上,日本男人、西方男人都救不了这个中国女人。谁能拯救“南京”呢?我的眼前,仿佛见到明末那位被逼得撞破头、撞出一把桃花扇的秦淮名妓李香君,她的爱人、大才子兼贵公子侯方域降了清,她只能出家,隐居林泉……

◇百味书斋

伍立杨

幽微处的亮光

余光中先生曾谓他读书或买书往往根据文字来作判断。一本书好不好,是否值得花功夫细赏,先要看他的文字是否清畅。倘若一本书文采郁郁,文字清畅,则值得一读,甚至可以百读不厌。然而可怪的是,有时候不少十足的文学书并不能给我们这种享受,那种夹缠不清的文字让人头疼。这类书有的从头到尾,始终吃语连天、言不及义,如不少报刊上的时文;有的偶有不通,却也非驴非马,味同嚼蜡,像周作人这样的文章大师也免不了这种败笔,他的散文《初恋》谓“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如此罗嗦、夹缠的不知所云,真可以把人考住了!

反而在某些非文学类书中,倒给我们意外的惊喜,仿佛在幽微处发现了亮光,在万枯之林遇洒法雨。他们的文字,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仔细品味。达尔文的自然哲学巨著《物种起源》是这样的书。按说这种讲自然变异和选择法则的书应是一览无余,实则令人一览不尽,虽然是知性文章,但却精新博丽,文字很有一番摇曳生姿的韵味趣味。他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一节“构造或体质上的细微差异,便能改变生活斗争的精密平衡,人类的愿望和努力消逝得何等快啊!人类的生涯是何等短暂啊!”这种感喟,因为是建立在逻辑的知性考察上,故其发为感叹,颇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在考察自然,同时也是叙说人类的复杂心境。既符合科学的旨趣,又有盎然的文学兴味,他的文字像醇酒,迷人又醉人。

还有一本博物学的书,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本书的文字也颇为深蔚妥帖。李时珍远走塞外大漠、南粤蛮荒,用力之勤,远在今之学者的田野调查之上;然后又坐拥书城,细梳典籍,虽然奇苦,也有大乐,尤其写到兴起,往往作文艺性质的衍生发挥,不能自释。其中有详细的考证,有对古人错讹的纠偏,有自己的心得发明,卷五十二结尾论人和病理,有数千字的长论,说到男女变异的事,他说“男化女,贤人去位;女化男,贱人为王。此虽以人事言,而其脏腑经络变易之微,不可测也。”又说“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物者为怪耶!”就颇有辩证法的味道,似乎也 可移来作文学评论的参考。他谈狗宝,引贾似道杀狗见异物的故实,引经据典,详述物理,最后升华到谈佛家优婆塞“行禅观之法,及死人火葬,心内包观音像如刻成,此皆志局于物,用志不分,精灵气液,因感而凝形,正如孕女感异像而成鬼胎之类,非祥也,病也,有情之无情也。”谈自然之理、病因之起,归结到情绪哲理,文字简洁深远,且不忘渲染气氛,确乎是难得的妙文。

这些书的文字趣味盎然,洋溢着静观文化的转圜余地,在字里行间,看得出对生命的无限留恋,不仅是自然之理,是确凿的发现,且更是一种独在的心情。

◇异域风情

万伯翱

微笑的日本

这次岁首的访日,除了观看乡下几个世界标准的滑雪场所带来的欣然和欢乐外,就是在城乡真正看到了日本服务人员的微笑。在大使馆官员们参加的宴会上,固然有日本外事官员和友好人民的不断地鞠躬致礼和“嗨嗨”声,我所感叹的还是民间中所有服务人员的灿如桃花般的微笑,我们下榻在东京“王子”和“樱塔”五星级饭店里,西服革履的经理和服务生对来往客人统统是先有笑容再说话。

有一次,我提出了把我刚从山梨县河口湖普乡先生发给我的,还没来得及食用的“定食”(盒饭),要配上这里五星级饭店的日本热汤荞麦面一起吃时,服务生连连摇头摇头说不成,但他却始终满脸带着友好笑容地解释着:“对不起,这是店规。我们这里从不能自带食品到餐厅来吃之。”我正无名火说他太死板,满脸晴转阴时,翻译解释说:“这是通常日本大饭店的规定,也是怕你如果吃坏了,难划责任。”服务生看我不高兴,思考了一会儿,仍是笑呵呵地说:“如您上楼在房间吃,我们可以送上热汤面,并不另加送餐费用。”这也许是店家“眼不见心不烦”或是不违犯本餐厅的规定吧,我也“转晴”着答应,携“定食”上楼等待去了。

我们所乘大巴的日本司机,每天我们上下车时也总是衣衫整洁,头脸梳理得干净光亮,满脸笑容相迎。咱们国内有些司机以为帮乘客拿行李是份外事或降低了他们的人格,常常袖手旁观“摆大爷”。而这位日本司机则不同,常常屈身爬进大巴最低层储藏室,把我们这二三十件沉重大箱小包,一件件摆放得不压不挤又整整齐齐再爬出来,这样的工作态度让我们这些中国客人不能不动容,而且他每天如此,从始至终绝不有任何松懈。几天后我们返国时,作为

团长的我感动得要求每一位老少团员都要和他握手道:“再见,十分谢谢您啦!”

在我们下榻的日本观光胜地静冈县乡下私人“大月酒店”就有温泉浴。实际上不像国内传说的男女同浴,此酒店分明标有“男汤”、“女汤”。我和李先生同住一套宽敞的“榻榻米”,沐浴前我们脱掉鞋袜和大衣。正不知如何穿日本传统的和服时,两位年老的穿着标准和服的服务员踏着日式拖鞋,弯腰微笑着走来,要为我们宽衣解带换和服。我和李先生请翻译告诉他们,请他们传授穿和服的方法,我们可以自己穿时,两位老妇人热情指点后,微笑着致礼退出。翻译说道,日本人常常并不着内裤。

在我们这座乡间宾馆,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服务人员中并不年轻的日本妇女(大概有四五十岁了),在我们入住和离开时,也都主动来搬沉重的行李,看着她们瘦弱的样子,尤其是穿着和服,脚下踏着拖鞋一摇一晃的身子,我们中国人也都连忙上去帮助她们,她们嘴里“嘿”着,脸上仍旧笑着,和我们一起把行李搬进又搬出。翻译还叮嘱我们:“不必付小费,这里不比香港和欧洲”。

在大月酒店,还有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穿着标准的职业套装,短裙西装长袜,脚踏黑色半跟皮鞋。她并不回避芳龄,告诉我们已 25 岁了,还未成家呢!她始终笑靥常挂,她的胸牌上写着“根本”。我都搞不清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和职务,因为,我们买东西时,她也在笑嘻嘻地解释小卖部货品的性质和食物的生产日期;我们去打乒乓球时,她飞快地又送拍子又送球,还又按时段来收银;而且她还笑着送我们上电梯,帮我们按电钮。临走,她的笑容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我们的车子远离开不见了才消失,但她的笑容却已深深地留在我们每一位的脑海中——和她的芳名一样,服务的“根本”亦是诚意会心的微笑。

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常说,中国姑娘和服务员是不会笑的,当然这是过去的看法。祈愿拥有上下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素以孔孟礼节为重的中国人,一天比一天笑容多如日本盛开的樱花。



◇一地鸡毛

王国华

杨家的敌人

我一直对潘仁美(潘美)的遭遇耿耿于怀。在民间流传的评书《杨家将》中,这是个反派大主角。有他作梗,杨家将始终收复不了幽云十六州;有他使坏,杨家父子战死疆场,尸骨不全;有他撺掇,杨门女将被迫披挂征衣上战场。但史书中的潘美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其人与赵匡胤交情深厚,曾拥立赵匡胤做皇帝,常年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他与杨继业有着共同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效忠。二人只有很少的合作,潘美虽有所疏失,但责任并不大。而评书中,潘仁美一生与杨家为敌,理由竟然是他私通大辽国,要当宋朝的皇帝。封建年代,叛乱是最大罪恶,屎盆子扣到这份上,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

一个人、一个家族好到什么份儿上,要看他的对手坏到什么份儿上。这就是我们上千年来的思维方式。为了表现一个人多么忠义,一定要把他的对手编排得坏得没边儿才行,哪怕是无中生有。为了衬托英雄之伟岸,多少无辜者被拉来垫背。民间戏曲《杨八姐游春》中,同样私通大辽国的还有一个叫刘文晋的人。此人是神宗刘皇后 的哥哥,仁宗皇帝的舅舅,时任兵部尚书。他为了帮仁宗皇帝抢杨八姐入宫,竟带着兵马攻打杨府,最后自然被杨府打败,于是仁宗幡然醒悟,不再为难杨家。整个故事无聊之极。但没关系,杨家将“刚正不阿”、“不事权贵”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出来了。这么一深究,“文革”期间的“高大全”形象也不是天下掉下的,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在里面,只是被发扬光大了。

西河大鼓和评书中有个传统节目,叫《杨金花夺印》(又名《三下南唐》、《呼杨合兵》等)。在这里,狄青、狄龙父子又成了反面典型。平西王狄青举贤不避亲,保举长子狄龙挂帅征南。包丞相提议在校场比武七天,以武艺高低论英雄。仁宗爱才,赏赐狄龙半副銮驾,狄龙仗着这半副銮驾,途经杨府非但不下马,还命人推倒上马牌、下马牌,怒打老总管杨洪。杨排风告知小姐杨金花,主仆二人女扮男装,小校场比武夺印。狄青恼羞成怒,兵困天波杨府等等等等。我很小就听这个故事,后来在史书中看到狄青平定依智高叛乱的丰功伟绩时,脑子空白了好半天,才确认此狄青就是彼狄青。连狄青这样的人都能成为杨家的敌人,还有谁不能?

英雄和好人不好做,需要有超常的智力体力和忍耐力,需要承担很多,但不一定与身边所有的人为敌;身边人可以用人性的弱点衬托他,何必一定使用人性之恶?二元思维,贻害匪浅啊。